

川大史学·冯汉骥卷

冯汉骥

卷

冯汉骥 著
张勋燎 白彬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川大史学

冯汉骥卷

冯汉骥 著
张勋燎 编
白 彬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年8月

责任编辑:吴雨时 张勋燎(特邀) 白 彬(特邀)
责任校对:朱兰双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冯汉骥卷/冯汉骥著;张勋燎,白彬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8
ISBN 7-5614-3493-6

I. 川... II ①冯...②张...③白... III. ①史学-文集②考古学史-中国-文集③中国-古代史-文集
IV. ①K0-53②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8638 号

书名 川大史学·冯汉骥卷

-
- | | | |
|------|-------------------------|--------------------------|
| 著者 | 冯汉骥 | |
| 编者 | 张勋燎 白彬 | |
| 出版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
| 地址 |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 |
| 发行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
| 印刷 | 郫县犀浦印刷厂 | |
| 成品尺寸 | 148 mm×210 mm | |
| 印张 | 16.75 | |
| 字数 | 385 千字 | |
| 版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
| 印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
| 印数 | 0 001~1 500 册 |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定价 | 48.00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封面
设计



原謀

028-8159 2865

設計工作室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冉光荣	石 硕	孙锦泉	刘复生
任新建	何一民	何 平	罗志田	陈廷湘
杨天宏	徐亮工	郭 齐	彭裕商	舒大刚
蔡崇榜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 长：王挺之

副组长：孙锦泉、舒大刚（常务）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应平	孙锦泉	李德英	陈廷湘
杨秀春	徐开来	舒大刚	鲍成志	霍 巍

秘 书：辛 旭

序

历史学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也是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在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中，即要求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与经学、词章并列，1918年改名为历史科。1924年国立成都大学正式组建了史学系，是川大历史上最早设立的10个系之一。

百余年来，张森楷、何鲁之、刘拔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激、丁山、陈衡哲、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吴天墀、胡鉴民、任乃强、杨人梗、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闻宥、常乃德、钱穆、缪钺、蒙思明、萧公权、卢剑波、谭英华、萧一山、吴廷璆、杨东莼、周传儒、柳诒徵、韩儒林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先后在此设帐授学，为川大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术繁荣的基础是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融会。回顾川大的史学发展史，至少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首先是近代“蜀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史之学”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在川大史学系任教的近代蜀学传人包括张森楷、叶秉诚、祝同曾、蒙文通等，在史学系之外则有龚道耕、刘咸炘、庞石帚等。在治学取向上，他们多重视古经、正史等基本典籍的训练，崇尚博通的治学取向，留意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新史学重视新材料扩充、重视问题意识等取向不

无距离。不过，这些学人也多少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又随个人和时代不同）。

其次是一批基本为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学人，包括何鲁之、刘挾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激等。他们或是留学生（多为留法者），或在国内受到较为完整的史学训练（多出自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他们之中不少人热衷于引介欧、美史学新理论，如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强调过去与现在并非渺不相涉，不主张将历史事实做孤立考察，而更注重其连贯性；同时，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对“问题”的解决，而尤其体现为对现实的启示意义。用何鲁之的话说，就是侧重“史学智识”，而非“历史整理”。

上述两批学者在文化态度、史学意义的认知上都颇有同调之处，与其时在国内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史学有着较大差异。他们的学术取向对后者不无纠偏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大史学的影响力。

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对史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川大史学灌注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了川大史学地位的迅速提升。

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是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徐中舒的一手培养下，古文字学和先秦史在川大生根结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地位。在考古学方面，田野调查与发掘之风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汉骥的提议和领导下，川大史学系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文物调查、三星堆、汶川石棺墓和前蜀王建墓的发掘等多项工作。

在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30年代末，冯汉骥两次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40年代初，胡鉴民对羌族、苗族等民族进行了调查。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

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0年代初，川大史地系表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各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随着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学者先后加入到巴蜀史的研究中，这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并形成川大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同年，蒙文通也发表了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提出了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任乃强转入民族学，也是由地理起步。1941年，史学系正式改名史地系。虽然1947年史、地系分家，但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取向则一直延续至今。

就学术建制而言，今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学科。华大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有独到之长，学术风格更近于主流派新史家。

华大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其中，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大学博物馆等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另外，跨学科研究、注重边缘和底层文化均是其特色之一。

华大历史学科早期的领导者主要是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等外国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开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由李安宅负实际责任，研究所成员有郑象铤、任乃强、于式玉等。由于成绩突出，仅仅成立一两年的时间，研究所就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1943年年鉴》。1941年，博物馆馆长一职由郑德坤接任。他与林名均、梁钊韬、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学者一道，继续推进博物馆建设，组织考古发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拉开序幕。华大历史学科全部并入川大，奠定了此后五十多年直到今天川大史学的基本格局。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下，川大史学研究形成了既注重新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实地调研，又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注重专业化的“问题意识”，又注重“通识”眼光的学术特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古文字学、地方史、考古学、民族史、西南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等传统优势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1981年颁布的首批博士点中，川大历史系就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两个专业入选。与此同时，一批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现代

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城市史、世界上古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也逐渐得到开拓，有的已跃居国内学界之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被授予“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0年）、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2001），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06年是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总结100多年来的办学与科研成就，推动学术的新发展，在学校的统筹规划下，我们特决定出版一套15卷本的《川大史学》丛书，分为“大师卷”和“专业卷”两个序列。“大师卷”中收录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六位先生的著作，代表了川大史学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应该说，长期在川大历史系工作而成就足以当得上“大师”之名的不止这六位先生，但这次由于时间仓促，不及为他们一一编辑专集，希望以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专业卷”按照二级（或三级）学科分卷，尽可能地收录在川大工作过的学者的论文。其中既有已经享誉学界的名家，也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因此，文章的质量必定各有高下、参差不齐，但对于每一个曾经和正在为川大史学的建设付出热情与心血的学者，能够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应该说也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历史文化学院

2006. 7

前 言

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在田野调查发掘、综合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西南考古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上世纪四十年代主持发掘的王建永陵，是我国第一次科学发掘的帝王陵墓；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葬材料的研究，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1977年去世，先生长期供职四川大学，任教授，在五十年代和挚友徐中舒先生一起共同创办的考古专业，培育了大批专业人才，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考古博物馆学系。今年四川大学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为了缅怀先生业绩，继承和发扬先生的学术传统，根据学界所期盼和学校的安排，要我们编辑这部文集出版。自知学力不逮，但作为长期追随先生亲聆教诲的学生和再传弟子，又是责无旁贷，只好勉力而为。

冯汉骥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国内大学攻读文科，兼修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后曾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和厦门大学图书馆领导职务，娴熟中国古代典籍。三十年代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193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理研究生院毕业，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按照美国的学制，认为人类学乃研究人类自身及社会发展历史规律之科学，了解古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况，除了依靠一般所谓的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本身的材料之外，必须同时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

若干学科相结合进行综合的考察。此等不同学科，虽各具特点，但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依存，无论研究其中之某一学科，均必须借助其他学科之材料与方法。故人类学系之学习，包括上述种种不同学科的内容，学生毕业后将来无论研究其中任何一门学问，均能充分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方法而有所成就。先生在留美期间，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于上述多种跨学科知识造诣甚深，对有关不同方面的材料和问题均能作精深的创造性研究，多有高水平的专门论著。如其早年成名之作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亲属制》(*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不仅对研究中国亲属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世界人类学研究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37年首次用英文发表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杂志，在学界影响很大，被视为研究中国亲属制的经典之作，后来作为专著出版，到1967年为止，已先后再版过三次。

先生在1937年学成归国以后，最初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三者并治而以人类学与民族学为主，一方面不断发表论文，同时在1949年前又撰成30余万言的《人类学》专著联系出版，因大陆解放而未果。50年代初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凡属与欧美之人文社会科学有关而非马克思主义之著作，一概被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内容而被列入批判对象之列，先生遂将书稿付之一炬。此外，先生还着手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材料作全面系统的清理，以正史及各省区州县方志记载为主，旁及其他多种四部文献，组织若干人参加工作。1949年大陆解放，事告中辍，已抄录的十几大箱材料也被当成废纸处理而全部散失。自1942年开始发掘王建墓以来，先生把研究重点逐渐转向考古，在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更是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了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将人类学、民族学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放到了为考古研

究服务的位置。

先生之学博大精深，纵横通贯，是最突出的特点。以横向而言，一是多种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二是中学和西学的融会贯通。以纵向而言，则是上下贯通，以观事物发展变化之规律。先生之治考古，力主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它在本质上“始终是历史科学”，“研究古物不是本来目的。只有把这些古物当做历史研究的材料时，它们才有科学价值。”按照他的观点，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的基础，不懂得田野考古，整个考古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但考古学家不应“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从表面上描述获得的物品，确定其年代、日常用途、制造技术、属于某一部落等等。这当然是研究的必要准备阶段，但是考古学如果只限于此，就没有权利考下去。在研究物品的时候，……应以阐明根据该史料可以探索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目的。决不能局限于只登记事实，而必须力求历史地说明它们”（《考古学通论·序论》讲义油印本）。由此观点出发，以广博深厚的中西跨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为基础，提出大量精辟独到的见解，形成了先生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先生的考古研究范围至广，从史前旧石器到历史时期的商周、两汉、南北朝、唐五代以至于明；从墓葬遗址到青铜器、陶器、石刻、画像；自工农业生产技术以至社会组织结构、名物制度、宗教、艺术、文明起源……不同时代、不同种类的材料，均有深入的专题研究。研究历史考古材料，除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材料相结合之外，特别强调古代文献材料的广泛运用，这是一个显著特点，在文集所收的论著中也都有充分的体现，特别是有关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葬和王建墓发掘材料的系列文章，尤为突出。

先生的著述，过去国内看到的大多只是用中文发表的部分，而且主要是四十年代以后考古方面的内容，对于四十年代以前在

国外用英文发表有关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著作则很少有人知道。数年前白彬留学哈佛，刻意收集，复印得若干种。这部文集的编辑，我们将先生用不同文字发表的论文收集起来，去除篇题内容之重复者，按中文与英文两大部分加以集中。中文部分三十三篇，其中考古类论文数量最多，大体按研究对象的时代先后为序，然后将从不同角度研究相同材料的著作集中在一起。英文部分共九篇，大体按撰著或发表的年代先后排序。为了避免与原意发生出入，英文部分一概按原文，不作翻译。

文集所收只是论文部分，不包括专著在内。为了便于对先生的学术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更好地继承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有关专著部分，如《王建墓发掘报告》、《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主编）、《湖北省立图书馆图书目录》（515页）等，特由白彬编纂《冯汉骥论著系年目录》附于文集书后，以供检索。但《冯汉骥论著系年目录》的内容并不是先生著述的全部。哲嗣士美先生家中今存先生遗稿，尚有石印、油印及毛笔誊抄之《人类学大纲》（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先史学纲要》、《考古学通论》讲稿等甚多，因残缺太甚，关系不明，难予登录，未能尽数反映出来。这是需要说明的。

为了便于读者对先生平生经历有更多的了解，征求士美先生意见，将童恩正教授撰写的《冯汉骥小传》附于文集之末，以供参考。

不当之处，尚希学界同仁不吝指正。

张勋燎 白彬

2006年3月25日

目 录

关于“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的地层问题·····	(1)
关于资阳人头骨化石问题·····	(7)
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	(12)
禹生石组辨·····	(19)
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	(40)
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	(54)
关于“楚公冢”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	(70)
四川古代的船棺葬·····	(77)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	(112)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	(144)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 ·····	(180)
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	(204)
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	(225)
论盘舞·····	(243)
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	(255)
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	(260)
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	(268)
驾头考·····	(280)
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	(303)
王建墓内出土“大带”考·····	(329)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	(337)
论南唐二陵中的玉册·····	(343)
元八思巴蒙文圣旨碑发现记·····	(357)
川康明清土司官印考·····	(363)
跋吴三桂周五年历书·····	(382)
傜僮与东爨·····	(384)
彝族的历史起源·····	(389)
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	(411)
西南古奴隶王国·····	(432)
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	(441)
略论玉蜀黍、番薯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传播·····	(463)
评张仲实译本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	(474)
摩尔根《古代社会》译校后记·····	(485)
附录一：冯汉骥论著系年目录·····	(512)
附录二：冯汉骥小传·····	童恩正(517)

关于“资阳人”头骨化石 出土的地层问题

资阳人头骨的发现，到现在已有三年多，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的确，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诚如翦伯赞先生所说：“资阳人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分布提出了新问题，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资阳人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向人类学家提出的新问题。”^①当资阳人发现之初，我个人曾予以密切的注意，头骨也曾在前西南博物馆展览过一段时期。因为当时缺乏研究仪器，除作了一些初步的形态学上的观察而外，未曾予以研究。不过我觉得关于此一重要发现的出土具体情况和地层问题，对于以后的研究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想提出来以供研究者的参考。

一种化石的年代，主要的是靠它所出的地层和其本身的形态，再加与其伴出的其他生物化石来决定。因为我没有参加关于资阳人的采集及后来的发掘工作，所以只能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推断。

前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关于成渝铁路筑路时出土文物的调查报告中，对于黄鳊溪古生物化石、人类遗骨的报告说：“（一）资阳黄鳊溪龙骨化石——第一批化石是西南铁路工程

① 翦伯赞：《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9期。